

貧乏的論爭 難預期的後果

● 程世則

一

近幾年中國大陸知識界一個最聲名遠播的現象，就是被命名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兩股思潮間的爭論。這場看似關乎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發展方向的爭論，吸引了廣泛的注意力，被反覆地評論、報導、談論。無疑這場爭論集中反映了當前中國知識界某些方面、某些層面的某些特點，而且幾乎沒有人認為先後被歸入「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旗下諸人的觀察與憂慮沒有其迫切的現實意義。但遺憾的是，綜觀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此場爭論雖然參與人數空前，尖銳和針鋒相對空前，但考察其內蘊，卻相當貧乏有限。

難道這就是90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所做重要努力的自然結果嗎？當然不是，而且相反。這場爭論之所以如此貧乏，在我看來，恰恰是90年代知識界既相當迫切又有價值的努力沒能有效進入論爭視域的結果。以自由主義研究思考狀況論，這些年漢語學術思想界研究、思考自由主義最有成就的學者思想者，像鄧正來、王焱、汪丁丁、賀衛方、李強、石元康、錢

永祥、趙剛、江宜樺^①等工作，和劉小楓等相當一部分的工作，不僅沒有正面被爭論者運用和討論，而且也沒有成為自命「自由主義」的論爭者學術思想的資源腹地。同樣，被劃歸為「新左派」旗下的汪暉、甘陽的絕大部分工作，王紹光關於國家能力問題的思考，崔之元所提到的理論資源、理論脈絡等等也沒有被認真對待。以上所舉還是一目了然和論爭雙方思想脈絡直接有關的這些年中國學術界的部分進展，至於那些看似和這場爭論無直接相關性而實質有關的進展，其命運就更可想而知了^②。

從同情的角度來講，這樣一種結果和參與論爭者的論爭目的相關。就是「新左派」方面的此次論爭目的並不是要批評自由主義的學理，而是在針對這些年籠罩大陸知識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最主要的特徵被描述為誇大市場的作用，認為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證，一個較大的中間階層為健康穩定的市民社會、自由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這樣市場的力量就不僅有解構現有專制國家的作用，而且大大有利於形成一個健康穩定的自由民主社會

近幾年，在中國知識界被命名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論中，「新左派」並不是要批評自由主義的學理，而是在針對這些年籠罩大陸知識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自由主義」一方面認為市場的存在大大削弱了專制國家對社會和個人的控制；另一方面認為「新左派」對民主的強調會導致社會不安，破壞中國改革現有的成果。

不可或缺的經濟體制和階級構成。而「新左派」則針鋒相對，批評「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市場拜物教，批評他們無視平等、公正的價值，認為變革中的中國社會正視平等、公正價值的最好保證是實行各種形式的民主。在論爭中，雙方都有很強的現實理由作背景。在「新左派」方面言，中國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已經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而且在原有的理論和實踐邏輯中看不到此問題被鄭重面對的徵象。在「自由主義」方面言，一方面改革後市場的存在大大削弱了專制國家對社會和個人的控制程度，社會和個人自由度大大加大，證明了市場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大革命」等以平等為價值號召的群眾烏托邦運動的後果讓人記憶猶新，因此對大規模群眾運動有一種深刻的不信任，認為新左派對民主的強調會導致社會不安，破壞中國改革現有的成果。

作為定神關注的旁觀者，我本來以為這場爭論對雙方都是一次機會。作為自由主義者，以此為契機考慮平等與公正問題，既在理論上正面對待融貫平等、公正價值，又在實踐上考慮制度的調整與創設，以使平等與公正的價值在現下社會狀況中有落實的可能，並因此確立自己分析批判不公正現象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作為「新左派」，則要在批判市場拜物教的同時，考慮市場的多面性，即在不同氛圍結構裏功能結果不同甚至相反的多面性，並在和自由主義共有的通向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富足社會的大目標下，考慮不同脈絡、不同問題下民主靈活多變的形式，在現有狀況下，以有具體針對性、建設性的民主方式，把個人和社會自由空間轉變成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人格等多方面的建設性成果。

這種不見得同意對方的理論立場，但卻認真對待對方問題的爭論方式，是我在爭論開始時所特別期待的。但實際爭論的展開和持續的樣態讓關注者吃驚，因為爭論很快變成了對對方道德的猜測、對論據的吹毛求疵和對論點的斷章取義的攻擊。「新左派」攻擊對方道德上麻木不仁、並已成為在不公正前提下獲取大量利益的既得利益群體的代言人。自由主義者則反唇相譏，認為「新左派」和現政權意識形態關係曖昧，指責「新左派」的觀點會導致民粹主義，甚至會為現政權強化專制提供藉口，認為「新左派」論調有礙於中國通向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一些旁觀者把積極參與論爭的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概括為里根主義 (Reaganism)、撒切爾主義 (Thatcherism) 的中國橫移。確實，這些自命的「自由主義者」還不如里根 (Ronald Reagan)、撒切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複雜和有現實感，因為里根、撒切爾夫人之強調市場有他們所處的問題脈絡，有他們的歷史和制度的上下文。而這場論爭中自命的「自由主義者」，卻對歷史、制度上下文問題缺少足夠耐心。而論爭中不少自命為「新左派」者，骨子裏竟有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爭論邏輯。凡是「自由主義者」批駁的，他們都一一辯護，甚至不惜為罪惡曲為回護。總之，雙方都不是在更複雜的層面上回應對手雖簡單但有其合理性的問題和邏輯，而是以同樣簡單、甚至更為簡單的方式來攻擊對手。

令人遺憾的不僅是爭論雙方沒有把爭論作為一個自我深化、複雜化的契機，而更在於論爭掩蓋了那些正在生長有待成形的重要努力。在近幾年大多數大陸學術思想狀況敘述者的筆下，「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成

本來，這場爭論對雙方都是一次機會，但爭論很快變成了對對方道德的猜測和對論點的斷章取義的攻擊。「新左派」攻擊對方已成為在不公正前提下獲取大量利益的既得利益群體的代言人。自由主義者則反唇相譏，認為「新左派」和現政權意識形態關係曖昧，有礙於中國通向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對比80、90年代，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80年代相當部分具活力和價值的思想工作是在國家體制內以合法、公開的方式展開的。90年代國家體制內思想氣氛則甚為沉悶，對直接富現實關懷的思考則百般警惕。這使得許多方面自由空間雖然均有所加大的中國90年代，但在思想氛圍上卻甚感壓抑。

了壓倒一切的濃墨重彩，似乎這場論爭是這幾年大陸知識界最應該被關注的學術思想活動。論爭同時使複雜的問題立場化，使思想和學術行為戲劇化，使參與人物角色化、單面化。這樣的學術和思想形象自然成了媒體記者筆下平面化、情節化的敘述對象，並給習慣以恩怨情仇方式把握世界者以可乘之機。這些都扭曲簡化了學界在不了解情況讀者心目中的形象。

沒有完美的敘述，任何角度的敘述都只是有利於在敘述脈絡上能被充分呈現的問題。相對於一個目標，兩種敘述之所以能被比較高低，是看哪種敘述可以更好地幫我們達致目標。如果我們現在設定的目標是了解中國大陸知識界最有質量、最有活力的那些進展，那麼我敢說以這場論爭作為自己的敘述主軸，絕對不會達致自己的目的。因為正如我前面所敘述的，即使人們假定當代大陸所有有價值的思想進展都是由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兩個陣線中人完成的，其在學術思想上最有價值的部分也沒有展現於論爭的視野。何況還有太多有價值的工作是怎麼也無法歸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陣營中去呢。

二

作為中國大陸知識界的一員，我每每有焦慮、緊張、無力的感覺。這種感覺的產生，首先在於一個努力思考、關心天下的人文知識份子很難在現有國家合法體制內找到貢獻自己的思考、為民族未來分擔責任的恰當工作位置。其次是因為面對這樣一個複雜的歷史情勢，中國知識界準備嚴重不足的當代知識思想狀況。以我一個朋友的經歷論，他所工作的雜誌在國

家所設計的學術等級制中處於最高等級，論文在該刊物上發表被認為是得到了代表專業研究最高水平雜誌的肯定。因此相當多的教育、科研單位，在該刊物上發表論文都特別看重，有些研究單位甚至認為，研究人員能在其上發表文章，就夠格被評為副教授。然而，這樣一個在國家學術運作、評價體系中有着很高地位的雜誌，在我那位朋友看來，其主導編輯思路、評價標準卻是混亂的、隨波逐流的。不說那些需要相當思考洞察能力才能發現和承擔的責任，就是在學科自身發展建設上，甚至單純實證知識的累積上，刊物都沒有起到明確的正面作用。而他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在他看來甚具荒謬感的工作，一是因為在此單位工作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較多，二來因為此小單位所處的大機構圖書不少，各研究門類齊全，且各學科都有一些出類拔萃者可討論問題。這樣，不是國家體制交給他的工作本身的價值，而是工作環境中的一些要素是他選擇現有工作為棲身之地的理由。

對比80、90年代，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80年代相當部分具活力和價值的思想工作是在國家體制內以合法、公開的方式展開的。90年代國家體制內思想氣氛則甚為沉悶，雖然其中人物不乏精彩、重要的思考和洞察，但它們在體制內卻不是以正面指明其思想、現實意義的方式，而是強調其知識價值的方式存在的。這一現象和國家導向有關。90年代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已大為削弱，但其對直接富現實關懷的思考則百般警惕。這使得許多方面自由空間均有所加大的中國90年代，在思想氛圍上卻甚感壓抑。加之，這種導向使國家體制內具體研究機構多為能和這種氛圍相適應者所當權，結果大範圍有意壓抑，小

範圍麻木不仁和平庸充斥。這樣，有良知的知識份子視如生命的現實和思想關心，在體制內反而主要以邊緣或背離自己關鍵本意的形象存在。體制內的思想、研究氣氛既如上述，那麼，那些由衝破國家實用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打破媒體淺嘗輒止、似是而非的談論的籠罩，掙脫專業視域、個人利益的羈絆的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其論題和交流都有相對穩定性和自主性的國家體制外「知識界」，情況又如何呢？

在很多人眼裏，「知識界」雖然只是一個沒有合法體制依托，隨時可能因外力擠壓而有從公共視野消失危險的交流場域，但卻是中國學術思想的活力希望所在，因此為許多讀者寄託其熱情之地^③。平情閱讀體會90年代知識界對當代中國應走道路的設計和分析，及對這些設計分析的批評意見，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樣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深刻轉型、頭緒繁多又困難四現危機四伏的時刻，雖然各家各派各有所見，但並沒有誰拿出一個論述令人信服、實踐又有充分可操作性的把握框架。在論爭中被作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的一群曾自信理清了這些問題，不過我想如果他們不孤立地看待中國的改革，而是置之於全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複雜背景中，並認真考慮現下嚴重的不公正等等一系列現實問題，他們應該重新創構自己的整體把握框架。

這還是只就轉型政治學、轉型經濟學、轉型文化學而言。在我的印象裏，當前通常意指的轉型成功主要是指經濟上軌道、社會穩定等明確指標的實現。如果我們把改革——轉型問題放在反思現代性背景下，並與國家民族長遠健康的發展和如何為世界文明做出不可替代的貢獻等根本性問題

關聯起來考慮，知識界會發現自己需要比孤立考慮轉型問題更為複雜的運思能力、更為敏銳的現實把握力和更為優異的歷史穿透力。孤立談轉型問題尚力有不足，複雜討論轉型問題無疑需作更多有意識的積累才有可能駕馭其複雜。

三

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這些變化中的一部分經常被我們提到和討論，另一部分則少聽人提到，更何遑討論。在這些影響了我們，但又沒被加以正面討論的情況中，我認為其中兩點對我們理解和評估這場論爭特別重要。我特別關切的第一個方面的情況就是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溝通斷絕。80年代通過當時的體改所等機構，國家和一部分知識精英間保持了良好的溝通關係，甚至一些溝通管道被體制化為國家建制的一部分。而在原有的國家體制內，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由於當時的整體氛圍和具體職掌者等的靈活掌握和眼光，一批敏銳活躍的人物被提拔了起來。和90年代知識界不同，80年代知識界相當部分的活動是以國家合法機構合法體制為依托的。

八九年事件不光造成了精英和現當權者間深刻的感情裂痕，而且破壞了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溝通的諸多管道。加之職掌意識形態和重要學術機構的領導人不具備一定的鑒別力和判斷力，使得具體學術部門的負責人基本上為庸才和技術官僚充斥。這些原因進一步造成了90年代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的隔絕狀態。一些偶爾存在的溝通，也是非制度的偶然的結果。

當前，轉型的成功主要是指經濟上軌道、社會穩定等明確指標的實現。但如果我們把改革——轉型問題放在反思現代性背景下，並與國家民族長遠發展和如何為世界文明做貢獻等關聯起來考慮，知識界就會發現，自己需要更為複雜的運思能力、更為敏銳的現實把握力和更為深入的歷史穿透力。

90年代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的隔絕狀態造成了雙重後果，一方面國家聽不到知識界許多有價值的分析、複雜的對策思路等等，另一方面知識界也得不到許多只能來自政府方面的重要信息。這種情況的好處是使知識界相對穩定的場域的形成；不好的是知識界的重要思考和觀察資源不被國家參照使用，是一筆太大的浪費。

在我看來，90年代雙方的隔絕造成了雙重後果，一方面國家聽不到知識界許多有價值的分析、複雜的對策思路等等，另一方面知識界也得不到許多只能來自政府方面的重要信息。這種情況的好處是使知識界少受不穩定的政治因素干擾，有利於知識界相對穩定的場域的形成；不好的是在這樣一個困難重重的時刻，知識界的重要思考和觀察資源不被國家參照使用，是一筆太大的浪費。

但損失不是單向的，在我看來，知識界得不到來自國家內部的多層互動這一後果影響甚至是更為深遠的。在目前中國，國家是唯一有渠道獲取關於全國完整信息的機構。如果政府把真實信息和知識界交流，知識界首先可以利用自己的專業訓練和自己局部研究的了解和體察，對政府的信息本身正確與否、誤差出入等給予分析。其次，信息不是孤立的，政府方面有自己的解讀、反應和評估這些信息的方式，知識界也有自己的解讀、反應和評估這些信息的方式，這兩者的方式有時可以互相補充，有時可以互相糾正。第三，政府人物因其工作角色的需要、會把各方面信息綜合整理成一完整圖景。尤其在這樣一個困難重重、危機重重的時刻，敏感而又試圖對民族負起責任來的權力精英，對匯聚到他眼前彼此纏繞扭結的問題和信息必須有一個回應與處理，那種身陷不知如何處理最好，又沒有起碼時間省思，而又不得不有所決斷造成的對現實的刻骨銘心，是穿透了現實表面後獲得的難於表述的現實感，是不在特定結構中、不陷入尷尬困境中就不可能有的感覺。這些本來就應該以各種方式成為關心民族未來者的共有財產。在80年代，權力精英的信息現實感一定程度上可和知識界分享，

但那時因為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共有一種樂觀主義——以為制度問題解決其他便可以水到渠成，所以80年代的危機感經常只是一種權力鬥爭帶來的危機感，而且一些知識份子經常把權力精英的現實感，直接移為自己的現實感，沒有認識到只有通過一定的反思批判互動程序，知識界才可把權力精英的現實圖景和現實感，轉化成自己對轉型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等現實狀況的一個綜合的現實圖景，獲得自己的現實感。

本來，知識界自身在信息和現實深入了解上能自力更生最好。但現下中國社會科學不發達，已有的資金、人力又多用在只會不斷複製和強化現有思維模式、甚至直接用來論證現行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項目上，因此單靠知識界自身的力量很難形成關於改革中的國家與社會的全面圖景。知識界自身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現實感和現實圖景作背景，是知識界分裂的重要原因。從「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論爭中我們可以看到，論爭參與者的現實焦慮主要來自個人對現實的直感和對現實的片斷了解，所以這場關於當下迫切現實的論爭反而帶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不是大家不使用現實和歷史的論據，而是由於把歷史和現實的論據從各自的脈絡和整體圖景中孤立出來，現實和歷史論據實際上僅僅成為了各種觀念的奴僕。不在相當程度上給出一個關於現實的完整圖景，讓人擔憂主要以現實關切名義進行的這場論爭會越來越淪為論爭勝利而驅使局部事實的論爭。

9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界與80年代的另一不同，就是學術思想工作自身也成了我們打量、反思的重要部分。不光在既有的學術脈絡、學科理解上關注一個人的知識準備、學理準備和

方法論上的自覺與否，而且舉凡為甚麼某類研究成為正統的？為甚麼某類研究是重要的，卻不是學院正統的？為甚麼某些問題我們熟視無睹，而另一些問題我們趨之若鶩？我們該怎樣使用理論才能使之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方便、更多的揭明作用和更少的遮蔽？我們該具有怎樣的意識和訓練才可能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現實感受力？哪些無意識和習慣限制與左右了我們的思考和研究？等等一類問題都有人思考探究。

近幾年，我日漸體認到如下兩部分人工作的迫切性：一種是深深捲進現實的學者，他們很清楚，在這樣困難重重的時刻，如果某一項經濟政策，某一項社會政策，某一項外交或文化或教育政策有偏差，其結果都可能是災難性的，是不知道經過多長時間才可能消化克服的。這些和現實搏鬥的學者，最直接和轉型中的現實艱難掛鉤。他們常常要放棄手中的理論和知識，兩手空空面對那些既不能被現有理論模型充分說明，又不能被已有成功經驗有效類比的具體問題。在知識界不能由國家途徑獲得現實充分信息的今天，這些學者的現實感尤為可貴。因為他們的現實感可以幫我們更準確有效地理解那些局部圖景，並在局部圖景間建立有效的勾聯，初步呈現一個有相當可信度的，知識界可以共享的現實圖景。

另外一部分我覺得怎麼評價其工作都不過份的，是那些致力於對我們學術思想工作自身不斷進行反思的知識份子。這部分人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像前一部分知識份子的工作那麼一目了然，但意義同樣深遠。閱讀好的反思性文字，是一種讓人既興奮又後怕的經歷。當我們知道那些我們熟視無睹，或稍加注意即棄置一旁的

事實可能正是最有力地塑造了我們的生存、感受和文化的的原因時；當我們知道我們自以為自由的思考事先就被一些未經過檢討的習慣和無意識所限制並規定了方向時；當我們被告知我們現有熟練的工作方式不會觸及的問題，可能正是使我們工作無效甚至臨危的隱憂所在時，閱讀的震驚和收穫可想而知。

最為理想的狀況當然是：在關於現實的完整圖景，關於現有的學術、思想、理論方式的批評性反思，關於和我們改革思考相關的理論圖式及本民族和他民族相關的歷史經驗都進行過最好地把握和討論，等等一系列工作都做完之後，知識界再來完成關於轉型中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的整體把握圖式。但現實問題的迫切性和流動性，使知識界不得不在前提性工作尚在進行的情況下，給出自己的整體性把握。不過，這種非理想狀況下不得不給出的工作，要求我們對之持一種有限的態度，一種隨時準備充實修正甚至放棄的態度。也就是說這一工作的完成者和擁護者要對複雜流動的現實、反思性工作和相關學理、經驗研究的進展，保持充分的敏覺和開放性。

可惜的是，在這場被命名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論——實際上是關於中國轉型如何才能有效，該如何選擇才無愧於良知的兩類整體把握圖式的爭論中，我們觸目所及的卻多是自己良心在懷、真理在手的排他式心態。不管多麼陣容鼎盛，多麼聲勢浩大，多麼富於現實責任感，論爭的內容都注定是貧乏的，因為論爭最積極、風頭最健的人物，不僅拒不對方有價值的觀察和問題開放，而且從根本上忘記了那些他們本該對之時刻敏覺和開放的資源：那些和現實搏鬥

9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界與80年代的另一不同，就是學術思想工作自身也成為打量、反思的重要部分。為甚麼某類研究是重要的，卻不是學院正統的？為甚麼某些問題我們熟視無睹，而另一些問題我們趨之若鶩？我們該具有怎樣的意識和訓練才可能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現實感受力？哪些無意識和習慣限制與左右了我們的思考和研究？

者的現實感，反思批判性工作，和在相關學理、經驗研究上取得的不斷進展。

四

在這場爭論中，我們觸目所及的卻多是自己良心在懷、真理在手的排他式心態。論爭最積極、風頭最健的人物，拒不向對方有價值的觀察和問題開放。其後果是論爭的聲勢浩大和結構簡單，造就了一批思想和心智都不複雜但機敏善辯的思想新星。這批人的存在加上媒體對這場論爭的理解程度，會更加固化這一簡單的結構。

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這場論爭還相當熾熱的時候，很多人已經感到了彼此互相猜計對方道德用心的作法毒化了知識界的討論氣氛，感到了這場論爭內容上的貧乏，卻少有人指出論爭雙方使用理論資源、使用現實資源、使用歷史資源、使用他民族資源的方式，和學界通常使用這些資源方式的關係；亦很少反思論爭者觀察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和邏輯與平時學界的方式和邏輯間的關係。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更少有人自覺去思考評估與解析大規模論爭的有效方式。因為從歷史經驗看，大規模的論爭雖然思想含金量令人起疑，卻往往是重塑氣氛、感覺、語言環境的關鍵時刻，通常它們不是以其思想的優秀改變人，而是以重塑氣氛、感覺和語言環境的方式影響、改變人。只要回顧一下民國時期的東西方文化論戰、社會史論戰等幾次思想含金量平平、但後果影響深遠的論戰，就可知道我現在絕對不是杞人憂天。究竟如何分析和預測眼前這場論爭的全部後果，非我一時所能勝任。但有些後果是眼下就能觀察到的：比如，論爭的聲勢浩大和結構簡單，造就了一批思想和心智都不複雜但機敏善辯的思想新星，這批人的存在加上媒體對這場論爭的理解程度，會更加固化這一簡單的結構；比如，論爭成了焦點後，公開和私下談論會自覺不自覺地與它相關，對那些本身思考能力就不足者，論爭的結構往往有一種吸納作

用，既會固化那些本來有一定流動性可塑性的感覺和思考，又會讓人自己忽略那些有待培育、卻不能歸於論爭結構中的苗頭、傾向；再比如，對那些本身已經成熟到足以抵拒論爭結構的複雜者來說，知識界刊物一定的論爭結構化，大大減少了可供更為獨特、複雜的思考生長展開的思想空間。

更有甚者，這場結構簡單的論爭中所蘊含的現實關懷和責任激情，使得不少人以此自足自立，無心於更複雜的思考和學習。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那種通過把某人某雜誌指為某某派，然後不理會其學術思想的貢獻，在這種論爭氣氛和結構裏，反倒儼然成了一種道德之舉。這一邏輯的普遍運用是這場爭論最令人扼腕和觸目的後果之一。比如，通過把一學者指稱為「某某派」，然後，用論爭中一般這派的觀點表現來概括其思想和用心，再脫離上下文孤立摘取其一些詞句，說明自己指稱的證據，以此來迴避和無視這位學者思想和理論上的貢獻。同樣的邏輯也降臨到曾作為當代中國知識界象徵的某雜誌上。通過指稱該雜誌為某某派刊物，無視該雜誌這幾年在打開知識界問題視域、學術理論視域上的有效成就，無視其把自己創建成一個思想空間、以促進中國知識界思想豐富和深化為職志的有效努力。

論爭爆發前雖然很多人都意識到一場展現分歧的爭論不可避免，並且多認為把私下的議論轉成公開的討論對建設一個健康開放的中國知識界有益無害，但我想，當時怎麼也不會有人想到論爭會以一種如此簡單和惡性的方式展開和持續。真的，一切太令人難以置信了。然而不管這場論爭曾經讓我們多麼驚愕和沮喪，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和面對，這就是發生在我們

身邊和眼前的、事前讓人怎麼也無法想像的事實。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才能克服這場論爭中知識界所暴露出的問題和論爭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出來呼籲建設一種和知識界一直大力倡導的民主公共相適應的論爭心態、論爭道德。確實，這場論爭在這一點上應該成為整個知識界的反省契機，就是我們自己的人格方式、道德方式是否已經隨着我們對民主公共的倡導而發生了相配合的根本轉變？因為一個健康的民主公共社會要求的決不只是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制度方面的解決，相應地它也要求倡導者和擁護者在一種人格、心態、道德和個人行為方式等方面的改變。從這一角度講，知識界決不該置身局外。

這場論爭中暴露出的論爭者不加反思地使用理論、歷史、現實、他民族資源之簡單粗暴，和觀察問題、思考問題方式之單一、邏輯之簡單等問題，一直是90年代不少學人、思想者反思工作的重要關心主題。不過這場爭論讓我明白到，要使批判性考察、省思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界實質而非形式的習慣性自覺，還有太長的路要走。很多學人亦久已省察到90年代知識界有一股把自己初步觀察、思考固化、結構化的傾向，許多人也一直致力於有意識地提供新的、可和這種固化傾向相互動，有益於其思想深化複雜化的理論資源，試圖幫助這股傾向再度開放自己，不斷面對新的問題。從這場論爭表現看，這一努力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但從這場論爭暴露出的內容貧乏、結構極度單純等問題看，這些努力是相當敏感的。因為這些人擔憂的不是知識份子有過於鮮明的立場選擇，它擔憂的勿寧是我們的思想缺少質量，我們缺少問題敏感。

它尤其擔憂的是把立場意識形態化，因為固化、簡單化、教條化緊接下來的後果就是扭曲了的現實感和思想活力的喪失。

在這樣一個讓人又感沮喪又感困惑不安的時刻，決心跟中國學術思想命運一起浮沉到底的學人該做甚麼，又能做到甚麼呢？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們至少應該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承擔責任。

對比許多知識界雜誌、學人都被吸納到論爭結構中去了的現實，我想我們首先該做到的，就是堅持獨立思想品格，同時關注那些論爭結構之外的複雜思考，那些更富流動性的思考，和所有那些既不能歸到既有學科脈絡中又不能歸到論爭結構中的思想的生長。當然這裏所謂的獨立思想空間，並不是要造成一個遠離論爭的象牙之塔，而只是警覺論爭中既富吸納性又富排他性的二元結構。我相信並承認論爭的喧囂下有尚未浮出水面的真問題，在歡迎被棄置於論爭視域之外的知識界那些重要努力的同時，也歡迎被論爭的喧囂淹沒於其中的問題的生長。其次，不應認為如此出人意料的論爭表現是一個偶然、孤立的結果，而應認為它是整個知識界，整個學術思想隊伍、制度、評價機制，整個社會、文化、道德、媒體現狀症候的一次集中表現。對論爭可以做各個層次的反思，但每一層次的反思都該發展成對自己、對環境的一次質問。認識不到一定程度決定表層現實生產的更為隱蔽的深層生產機制，我們會被豐繁的表層現實欺騙、誤導，認識不到表層事件通常還具有特異性、偶然性一面，尤其認識不到深層生產機制本身的可變性和流動性，我們又會被貌似理智的機械套用理論的思考欺騙。具體而非抽象地關注理論和現

很多學人亦久已省察到90年代知識界的把自己初步觀察、思考固化、結構化的傾向。這些人擔憂的不是知識份子有過於鮮明的立場選擇，而是思想缺少質量，缺少對問題敏感，尤其擔憂的是把立場意識形態化，教條化的後果就是扭曲了的現實感和喪失思想活力。我們首先該做到的，就是堅持獨立思想品格，但又不是要造成遠離論爭的象牙之塔。

不應認為如此出人意料的論爭表現是偶然、孤立的結果，而應認為它是整個知識界，整個學術思想隊伍、制度、評價機制，整個社會、文化、道德、媒體現狀症候的一次集中表現。思考這場論爭中的問題所在，思考通過那些途徑會一定程度克服這些問題，是論爭之後每一個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識份子不可推卸的責任。

實、歷史的關係，應該成為今後我們關注的永恆主題。其三，對論爭所暴露出問題的克服，不應該是一種形式上的克服。比如，在反思論爭者對歷史、文化、制度等處境都甚不相同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資源簡單粗暴的使用時，除講清使用者使用方式的謬誤，和這種粗暴的使用會給我們自己帶來甚麼損害外，我們不妨自身投入精力作深入其他國家、地區學術、思想現實與歷史以及相關經驗資源的嘗試，於其中致力尋找那些深深有助於理解和反思我們自己的資源點。反過來，這其中蘊涵的對我們深深的刺激和啟發，也幫助我們刻骨銘心地進入對方的生活和歷史。這樣的積累和收穫與大陸通常學院內和媒體上關於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知識運作極為不同。我們知道，只有這種性質的累積不斷增加，我們才能徹底擺脫對其他國家地區資源的使用只是在形式上的正確與謬誤間搖擺這一實質上的困境。我們也才能徹底擺脫中國大陸當前只有中西資源發生實質作用，其他資源只是形式上發揮作用的中西二元知識圖景。其四，我們深深知道，許多問題不僅不能用和這次論爭的關係來定位其價值，甚至不能用和這時代任何一個具體現實目標的關係來定位其價值。但它們卻在每一事件上，當然包括這次論爭事件上以很難把握和描述的方式刻下深深的印痕，比如感受力、洞察力、思想力、創造力等。對這些我們能感到卻無法賦形的問題，我們都必需尋找方式面對它、接近它，以期能在一定程度獲得它。

思考這場論爭中的問題所在，思考通過那些途徑會一定程度克服這些問題，是論爭之後每一個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識份子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這其中許多工作並不需特別思想

力、洞察力，而只要有持之以恆的責任感、韌性和足夠的心力投入就一定程度能勝任。

中國知識份子應該為民族的命運負起責任。既然命運已經來到門外，那麼，就讓它進來吧。

註釋

① 此處提到的石元康先生是香港學者，錢永祥、趙剛、江宜樺先生是台灣學者。此處提到他們，一是由於他們也在大陸知識界刊物上發表文章，二是由於他們和大陸知識界的交往討論甚多，他們在港台發表的不少文章也為大陸學者讀到。

② 此次在平面媒體上未充分展開，但在網絡上全面鋪開的論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公認在自由主義學理研究方面最有造詣的學者，都沒有直接捲入論爭。而被列為「新左派」代表的汪暉、甘陽等人也都拒絕「新左派」的指稱。所以如此，我想是因為這場論爭最熱烈的參加者，不是以誠懇討論問題的方式，而是以建立彼此截然分開、缺少縱深感的陣線對立的方式展開論爭的。這種論爭方式，必然使學理、思考複雜者無法展開其所學所思。所以本文所批評的這場「論爭」，只是在批評那些滿足於此種論爭方式、論爭劃線、論爭結構的參與者，並不包括那些沒有捲入論爭，但本身有明確立場、在自由主義和左翼思潮研究思考上有成就的學者、思想者，當然也不包括汪暉、甘陽等本人不承認論爭者的指稱，究其實際所學所思所寫亦不能由論爭陣線對判的方式加以把握的學者。

③ 詳細描述當代中國大陸「知識界」場域形成演變的歷史，探討其特徵和多種功能，為深了解中國當代知識、思想、文化、政治生活所不可或缺。但要完成此一任務需專門撰文甚至撰書。

程世則 學者，現居大陸。